

90後人均負債超12萬！這件事正在摧毀中國年輕一代

秃掉的头、垮掉的胃、熬过的夜、裸过的贷、整过的容……这几年，90后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多少人一边活得光鲜亮丽，一边又过着不如狗的生活。

生活压力大，买不起房，我总能买一个喜欢的包、最新款的手机、最新款的鞋。房子是租的，但生活是自己的，总之要有精致的生活，生活品质不能丢……

“敢消费，敢借贷”是这代年轻人的消费观。

01、这个时代，想借钱给你的人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

在豆瓣上，有一个将近3万人的“负债者联盟”小组。

因为无节制消费、网赌等，这个小组里聚集了27942个背上网贷的年轻人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毕业不久的90后、在校大学生。

这些年轻人大多是拆东墙补西墙，维持“以贷养贷”的局面，有的人甚至背负了十几个网贷平台的债务，综合不同的平台、利滚利之后的债务总额将近达到百万元，最终陷入泥潭，无法自拔。

根据尼尔森公布的《中国年轻人负债情况报告》显示，中国有86.6%的年轻人在使用信贷产品，其负债率为47.75%，其中仅有13.4%的年轻人是零负债。去除“支付工具”部分，近6成工作

90后拥有实质性负债，比例高于其他年轻人群。

美容有美容贷、旅游有旅游贷、学习有学习贷。不论是购物、美容、外卖、旅游还是学习，消费贷早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在诱导你分期付款。

根据火行最新显示，截至2020年6月末，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，贷款余额8841亿元。

这个时代，想借钱给你的人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。

02、“给自己最好的”的前提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

有这样一个小故事，讲的是一个中国老人和一个美国老人的故事：

中国老人攒了一辈子的钱，终于在晚年买了新房，住进了新房。而美国老人，年轻时就贷款买了新房，一辈子住好房子，在晚年终于还清了贷款。

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人保守的消费观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有数据统计发现，本世纪初，国民储蓄率55%，而现在的储蓄率已经快速下降到了45%，居民负债200万亿。

收入不足以支撑消费支出，是现在多数年轻人的真实生活状况，但即便如此，也不影响买买

买。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消费观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呢？

1、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层出不穷的小额信贷产品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手机号和一张身份证，可以借多少钱？

答案是至少35万元以上。除此之外，很多平台现在都可以分期付款，分期之后看似没多少钱，但是积少成多，凑在一起可能就是一大笔钱了。

2、西方消费思维影响

我们都知道西方很多国家的消费理念都是超前消费的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，国人的消费习惯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，人们越来越倾向通过借贷等方式来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。

3、经济的高速发展

90后以及00后的成长刚好享受到国家经济崛起的红利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，生活品质也在逐步提升，但是由于刚刚参加工作不久，收入水平普遍不高，因此他们更愿意超前消费。

4、广告营销

“千万别在最好的年龄里，吃的贼肥、穿的贼丑，把自己活的贼便宜，对着手机美颜心里还直乐”

“没有一个姑娘会因为买买



买变穷，尤其是漂亮的姑娘！”

“聪明的女人，舍得为自己花钱。”

“有钱人，都是高负债的，都是拿着别人的钱过日子。”

各种广告，洗脑般地频繁出现在年轻人面前，莫名影响着这代年轻人。

营销，正在把幸福的标准调得越来越高。

“在能力范围内给自己最好的”，年轻人往往记住了后面，却忽视了能力范围内的重要性。

03. 信贷逾期后果有多严重？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

至2019年9月末，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.34亿张，环比增长3.25%。同时，给年轻人房贷之后，银行还出现了大规模的信贷逾期。

截至2019年6月底，我国仅信用卡消费就已经出现了80亿元的违约金额，更别提审核门槛更低的金融机构和网贷平台。

根据汇非银行此前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来看，90后人群所背负的债务与收入的比率达到了1850%，90后欠信用卡发行机构以及各种贷款机构的人均债务已经超过了12万元。

17岁从军、40岁跻身厅级的“博士市长”落马！5天前还在接访群众

石家庄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邓沛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河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

公开简历显示，邓沛然，男，汉族，1963年7月生，献县人，1984年1月入党，1980年11月参加工作，河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毕业，在职研究生学历，经济学博士学位，高级政工师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17岁从军，8年间曾是石家庄陆军学校学员、解放军27军侦察连排长、侦察处技侦室主任。25岁转业地方，此后曾在纪检系统工作10年，40岁跻身厅级。

1999年起，邓沛然历任河北省物资储运总公司副总经理，河北物产企业(集团)公司纪委书记、党委常委等职。2003年，邓沛然任河北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组长，省教育纪工委书记，2007年任省监察厅副厅长。

2010年11月邓沛然出任沧州市委副书记，2013年转任河北省供销社党组书记、理事会主任。2016年12月出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，市政府代市长、党组书记。2017年4月出任省会石家庄市委副书记、市长，直到本次落马。

截至发稿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市政府领导信息栏，市长仍显示“邓沛然”，职责为“领导市政府全面工作，分管市审计局”。

最近的一次是12月16日，邓沛然在市群众工作中心接访回访并视频回访，现场研究、协调、解决信访问题。邓沛然说，信访工作是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工作，真上心、真上手，真推进、真落实，把信访工作落到实处，把问题解决到位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、消除在萌芽状态。

12月12日上午，邓沛然在市工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作全市经济形势报告。报道称，会上，邓沛然通过PPT形式，以翔实的数据、丰富的图片和大量的事例，生动展示了今年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分析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，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。

邓沛然近期还视察过防疫工作。12月5日，邓沛然督导检查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，始终把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抓在手上、落到实处，坚决切断冷链物流病毒传播途径。

“两会”上数次关注城市协同发展

邓沛然曾数次在“两会”上关注石家庄的区域化协同发展问题。

2017年4月13日上午，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的邓沛然在参加市两会的代表团分组审议时指出，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正在深入实施，特别是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，都为石家庄市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，要紧紧抓住这些机遇，强化使命担当，自觉奋发作为，集中精力加快发展。他还强调，要通过加强对重点片区的规划管控，以土地大片区收储为抓手，做活城市经营文章，为城镇建设提供支撑。

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，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邓沛然在分组审议时说，“高铁时代，石家庄不能被边缘！”他指出，石济客专设计时速是250公里，由济南至上海高铁设计时速是350公里，“石济客专真正效用应该是打通河北与长三角的联系，现在石家庄至济南段速度达不到，无法连通长三角。如果打通了，四五个小时可以到达上海。”

GDP四强省份三个已深度老龄化：山东最老，广东最年轻

3个大省已深度老龄化

一般来说，我们会根据人口的年龄不同，划分为三个大的年龄段，首先是0至14岁的人口，代表少年儿童人口；15至64岁的人口，代表劳动力人口；65岁以上的人口，代表老年人口。国际上一般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%，称为“深度老龄化社会”；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20%，称为“超老龄化社会”。

根据这一标准，当前四个经济大省中，山东、江苏和浙江三个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。这其中，山东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最高，达到了15.84%，相当于山东65岁的老人共有1595万人，也是全国老龄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。

除了总量大以外，山东老龄人口占比高，跟其他两个年龄段有关。从三个年龄段来看，山东呈现“两头高、中间低的特征。”数据显示，山东15-64岁的人口占比仅为66.49%，是四个经济大省中唯一一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，在全国各省份中也仅高于贵州，位居全国倒数第二。

山东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低，与近年来山东人口外流有关，山东也是沿海四个经济大省中唯一个人口净流出省份。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，数据显示，2017年到2019年，山东人口净流出分别为41.97万人、19.55万人、19.93万人，近三年合计净流出达到了81.45万人。如果扩展到更长的时间来看，2014年到2019年的6年间，山东人口净流出已经多达105.78万人。

人口外流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。从山东的产业结构来看，其主营业务收入排前列的轻工、化工、机械、纺织、冶金多为资源型产业，与年轻人的向往并不匹配。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，山东的传统产业占比比较高，包括煤、钢等重化工业突出，新兴产业与广东江浙差距很大。

山东之后，第二经济大省江苏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了15.1%，在四个经济大省中位居第二。江苏的老龄化程度高，有多重因素。一方面，江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，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比

较低。另一方面，相比浙江和广东，江苏吸引的省外净流入人口较少。由于省内存在明显的南北落差，江苏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苏北、苏中往苏南流动，一部分流向上海等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从四个经济大省的老龄化程度来看，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递减的趋势，即山东高于江苏、江苏高于浙江、浙江高于广东的格局。

浙江人口净流入赶超广东

虽然浙江也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，但相比山东以及江苏，近年来浙江大量外来人口流入，使得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比较高。数据显示，去年浙江15-64岁人口占比为72.91%，位居全国第13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.31个百分点。

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《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》分析指出，2011-2014年，由于大规模推动机器换人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浙江常住人口呈小幅净流出态势。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，从2015年起，常住人口重新开始净流入，且净流入规模不断扩大，由2015年的3.3万人扩大到2019年的84.1万人。2017-2019年，浙江人口增量分别为67万、80万和113万人，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位，仅次于广东；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为31.3万、49.0万和84.1万人，其中2017年和2018年列广东之后，居全国第二位，2019年居全国第一。

该报告分析指出，人口净流入的不断增长，说明浙江吸引了全国其他地区，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就业(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，浙江的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包括安徽、河南、贵州、江西、四川等)。目前，浙江全社会年龄结构呈现“两头低、中间高”的橄榄状特征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，仍处于人口红利期。

近年来浙江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就是数字经济。浙江是数字经济的先发地。近年来浙江工业经济向形态更高级、分工更优化、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进过程中，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而工业的升级又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发展

的基础。

这其中，省会杭州更是着力打造“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”。杭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3795亿元，增长15.1%，比上年提高0.1个百分点，高于GDP增速8.3个百分点。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增长14.6%，物联网产业增加值增长13.6%，数字内容产业增加值增长16.3%，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增加值增长15.7%。

2019年，杭州常住人口从2018年的980.6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1036万人，增量达55.4万人，年度增量首次超过深圳和广州，位居全国第一。

不过前述报告也指出，当前浙江16-24岁群体比例明显偏低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当这部分人群成为30岁以上壮年劳动力时，如果没有外来净流入人口的补充，全社会劳动力将出现明显不足。同时，10-15年后，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%-26%，进入超老龄化阶段，这将对浙江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提出较大挑战。

广东为何最年轻

相比鲁苏浙，身处华南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，目前65岁老龄人口占比仅为8.57%，与其他三个大省都要低很多，离深度老龄化也有较远的距离。

广东的老龄化程度较轻，主要是人口增长较快。近年来广东人口增长呈现迅猛态势，数据显示，2014年广东常住人口为10724万人。也就是说，近5年广东人口增加了797万人，接近800万大关，略等于一个合肥市的人口数量。

人口增长多，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出生率较高，自然增长多。比如受传统宗族文化、生育文化影响，粤东的潮汕、粤西的湛江、茂名等地一直保持较高的出生率，因此0-14岁少儿占比比较高。数据显示，广东的少儿人口占比达到了15.97%。

另一方面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广东的人口流入规模非常大。虽然2019年净流入规模被浙江超过，但是广东已经多年保持快速的人口流入态势。在珠三角的东莞和深圳，更是出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倒挂现象。